

赶赴乌干达的田野思考

张仁焯

作为海外研究的学生，疫情之下出国何其困难，又何其幸运。前往乌干达的计划原定于2020年2月启程，本该是与家人告别的春节却因为新冠的到来而变成了史上最漫长的一个假期。随着全球各地陆续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前往乌干达的客机也进入停飞，复飞遥遥无期。一时间，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变得遥不可及。世界范围内的相对停摆对于海外研究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加之人类学将参与式观察奉为圭臬，无法亲临现场的我在漫长的等待中变得越来越焦虑且绝望，甚至很多次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机会继续海外研究——如果做，疫情之下该如何做？如果不做，又该做什么呢？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只能通过其他学者的文字，一次次地触碰遥远的非洲大陆。而正是非洲研究学者精彩的田野故事，持续地滋养我对于乌干达的向往，让我不愿放弃田野计划。如果疫情之下对人类学或者海外研究的学生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那第一条一定是“好好读书”，只有好好读书才能缓解不能出发的焦虑，为随时可能到来的启程做准备。

幸运的是，国内的“清零”政策让周遭的生活逐渐步入了正轨，学校也出现了派遣学生开展海外学习的案例。于是，2021年6月，我满心期待地重启赴乌计划，希望在学期结束之前能够得到前往乌干达的批复。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也是激动的，我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学校的回复。本以为国内好转的疫情能让我顺利地

[收稿日期] 2022-05-20; [修订日期] 2022-06-22。

[作者简介] 张仁焯，女，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乌干达。

出行,7月12日我却收到了“因为乌干达‘德尔塔’病毒暴发,医院不堪重负,为确保同学安全建议暂缓出行”的通知。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再次打击了我,让我对接下来的学习计划手足无措。崩溃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导师适时地出现,鼓励我在此期间,不如先从之前认识的在乌华人开始,着手线上的访谈工作,这也让我对无可奈何的现状有了一些行动方向。

然而,隔着屏幕的远程交流和身处其中的田野研究竟是如此不同,社会文化情境的缺乏使得我在每次访谈结束后,都有似懂非懂的困惑和难以言说的距离感。物理上的距离不仅让我无法感受异文化的魅力,也对异文化下的人失去了判断力和想象力。这种深深的无力感让我再一次向学校申请前往乌干达。2021年11月,心灰意冷的我惊喜地收到了学校的申请通过书。那一刻,我甚至激动地叫了出来。因为这意味着我终于可以奔赴那片心心念念的土地,也终于不用再隔着时差跟人聊天,可以切切实实地打破远距离的交流障碍了。

那时候,我天真地以为空间上的距离是田野工作的最大阻碍,殊不知疫情之下社会文化上的差距才是此行真正的考验。

12月21日中午,我在家人的陪伴下到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昔日满满当当的停车场此时门可罗雀。偌大的航站楼也仅开放了一个值机区域,专门服务我们这趟航班的乘客。在等待值机的间隙,我观察着这些在疫情期间的“逆行者”。外国人的数量并不太多,持公务护照的中国人熙熙攘攘地安插在队伍中间,其中也不乏出国寻找致富机会的商人以及长期在外的民企工作者,而队伍最后成群结队的出国务工团队显然是这趟班机的主要成员,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世界各地的中国工程。令我惊讶的是,女性的身影寥寥无几,大多都是30至5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为了讨生活嘛”,一位前往加纳的大叔如是形容他们出行的目的。在他看来,如果不是因为在国内缺少稳定的收入,很少有人愿意去海外干工程,不仅辛苦,还

要忍受寂寞。疫情之下,每一个逆行者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推动着他走向未知的世界。

几经周折,我终于到达候机大厅。出于对新冠的害怕,我打算在候机过程中就把自己喂饱,拒绝在飞机上吃喝拉撒。正当我在“暴饮暴食”之际,身边的一位大哥也对同伴说:“上了飞机就不能吃了,趁现在赶紧吃饱点,别感染新冠了。”同行的几位伙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泡面,一个接一个地前往饮水处泡泡面。如果不是在机场,饮水机边上的盛况让我误以为自己身在十年前的绿皮火车上,大家或蹲或站,在充斥着泡面味道的空间里吸面条。事实上,这里是国际航班的候机室,等待我们的不是一趟没有餐食的绿皮火车,而是提供免费餐食的卡塔尔客机,但吃着泡面的每一个人都因为害怕新冠而选择提前把自己喂饱,把风险降到最低。那时的我还暗自窃喜,庆幸自己和大家一样都是新冠面前的“讲究人”。就像登机前,很多国人都拿出了N95口罩、面罩、手套、防护服,为这趟“危险”的旅行做完全的准备。我们共享同一种文化秩序,觉得新冠是可怕的、需要严防死守的。然而,此时的我,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即将前往一个并不是中国人占绝对大多数的外部世界,即将面对全然不同的文化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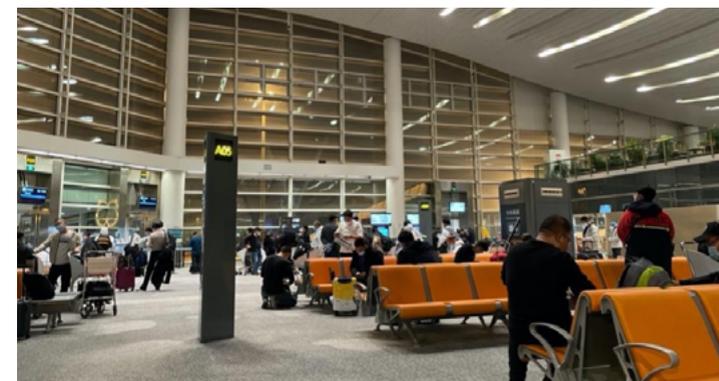


图1 全副武装准备登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相较于我们的谨小慎微，右侧的外国人似乎对机舱中的“危险”一无所知，连口罩都戴得非常敷衍。那时的我内心只有一个想法：离他越远越好。原本以为只要再坚持5个小时，我就可以安全到达乌干达，但由于前序航班的晚点我只能在多哈继续停留16个小时，再经由肯尼亚飞往乌干达。经过多次申诉，卡塔尔航空的工作人员终于同意为我和一位同机的中国人提供两间休息室以及一顿免费餐食。我一边拖着疲惫的身体前往休息室，一边向家里人报平安。听闻我的经历，家人第一时间向我确认“房间安不安全(有没有病毒)”、“碰门把手之后记得洗手”、“到了房间也不要摘口罩”……他们担心着整个墙外世界的安全性，让我处处留意。确实，我也照做了。我拿着酒精对着房间一顿喷，一遍又一遍地洗手，也坚持在房间里戴着口罩，试图为自己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休息环境。

然而，当我身着隔离衣、佩戴口罩和面罩行走在机场，我的安全方式似乎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奇装异服”。路过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我，甚至回头驻足。起初我对这样的注视感到奇怪，直到一个外国小哥停下来问我：“你需要救护车吗？只有得新冠的人才像你这样穿。”看着他面带挑衅地离开，我愤怒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这样穿有错吗？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难道在国外的文化情境下，穿成这样的人就是得了新冠的人？正当我陷入自我怀疑之时，又有人挑衅般地询问我：“你还好吗？”这样的询问一次又一次地在旅途中发生，让我不得不开始思考。当身处国内的我们普遍觉得国际旅行充满危险、需时时刻刻做好防护措施的时候，外国人却认为佩戴口罩已经是他们为防疫做出的最大努力了，更多的防护措施只会让人觉得你已经感染了新冠或其他传染病，甚至把你当成一个“怪人”，注视你、议论你、嘲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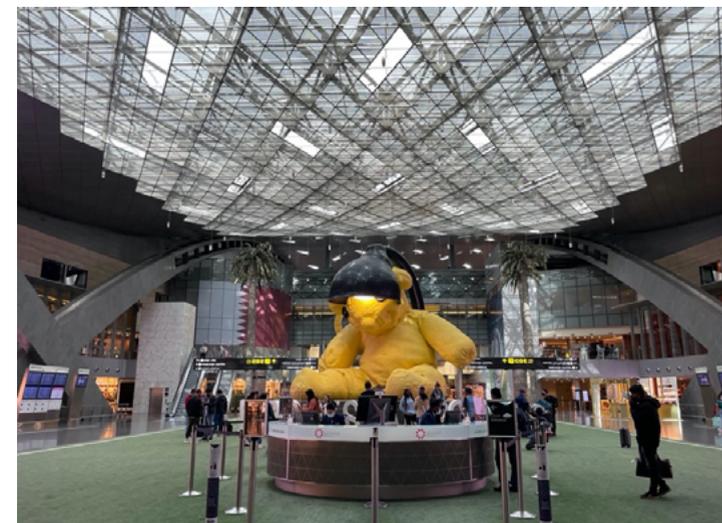


图2 几近恢复往昔的卡塔尔机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如果我只是来旅游，我可以毫不在意地我行我素；可是当我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学生来到海外进行研究之时，我必须思考如何面对疫情之下的文化差异。一同滞留多哈的中国大哥在非洲多年，面对我的困惑如是说：“其实你在这个环境下，你也觉得没那么严重”。所以，新冠在我们看来很可怕，但在外国人看来不可怕，这说明新冠是一个会因为社会情境而改变的病毒吗？我想并非如此。那新冠之下，害怕病毒的我应当如何与不害怕病毒的他者进行交流呢？更宽泛地说，当我们面对文化间的巨大差异时，该如何继续我们的研究呢？

12月23日，当我经过漫长而疲惫的旅途到达乌干达时，我见到了同样“全副武装”的对接人和一个戴着破烂口罩的司机。像很多乌干达人一样，这个司机坚定地告诉我说：“乌干达是被上帝眷顾的地方，我们这里没有疫情，不用戴口罩。”而对接人是乌干达首都小有名气的中国医生，他告诉我临近圣诞节，乌干达的新冠病例每天都在千人以上，嘱咐我务必戴好口罩、减少出行。到达乌干达

后的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应该继续做好防疫措施还是卸下“防备”拥抱这个国家？初到的几个星期里我迟迟没有答案，只敢浅浅地在居住区域附近走走。原以为在疫情之下走出国门就是进行田野研究的最大胜利，没想到我所以为的田野研究竟被局限在一处小小的餐厅，大部分信息都来自造访的顾客。

不久，餐厅的几位客人邀请我一同出游，我忐忑又激动地答应了，毕竟这是一次挖掘田野材料的绝佳机会。路途中，客人不断向我讲述他们在乌干达的趣事，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的非正常生活。“但是我跟你说，大部分在乌干达的中国人都得过新冠，除非他完全不跟人交流”，一个姐姐如是说。姐姐的话让我茅塞顿开，我来乌干达的目的就是和人面对面地交流，一味追求安全的结果很有可能让我丢失这次田野的初衷。既然来了，我就应当在适当保护自我的前提下，尽力地拥抱这个国家。人类学学者的每一次田野都充满了意外和挑战，而正是它们，赋予了每一次田野新的内容和意义，田野才因此流动起来。来之前，我把田野想得太简单；来之后，我把田野想得太困难。此时此刻，我只想好好感受并记录田野中的每一天，把一切想象都归于一步一步的脚印、一次一次的对话。



图3 “奥密克戎”肆虐期间的乌干达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责任编辑：李音

文字审校：王琴